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3期（民國105年9月），1-3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交情報與港際報業：以1874年臺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

朱瑪瓏**

摘　要

十九世紀東亞報業史研究常侷限於個別國家或單一語言，用以解釋中、日兩國各自的閱讀大眾或民族主義的興起。本文則以近代東亞重要外交事件——1874年臺灣事件——為焦點，檢視當時針對這個事件的跨國報業運作。本文指出，當時在各口岸發行的英文報紙，成為各種中、日文報導消息的中介。中、日文等不同文本的海上運兵消息，藉由英文報紙的翻譯、轉刊，跨語際地迅速流轉於橫濱、上海、香港等東亞主要港口。這種流通受惠於不久前才開始的定期輪船航線及海底電纜等新交通設施，我將之稱為「港際情報體制」。口岸裡的英美等國外交領事、傳教士、商人、中國海關裡的洋員，和與英文報館關係密切的中文報人，均成為新體制下的要角。此一口岸間經由海上經濟所構築出來的英語消息迴路，揭露了近代「帝國式安全國家」興起過程中，重要的貿易史脈絡。

關鍵詞：英文報紙、跨國報業、港際情報體制、1874年臺灣事件

* 本文不同階段的兩份初稿，曾於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與發表會上宣讀，獲許多學者專家提供修改建議；中研院人社中心劉序楓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林志龍教授與廣島大學陳貞竹博士引介日文資料；審查期間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改進意見，謹此一併致上由衷謝意。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6年10月17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接觸區的訊息流通

訊息流動在晚近成為多種科學史、帝國史與翻譯研究的共同課題。科學史研究者主張去除科學知識由歐美中心向外擴張的理論（如「西學東來」），強調多向互動，以及在接觸區（the contact zone）各種在地的實際科學技術運作與創造發明。在接觸區裡，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的行動者在知識生產或轉譯上的掮客角色，成為這一研究取徑的主要對象。[1]科學史領域之外，翻譯研究也關心跨語言的雙向溝通。帝國史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殖民地訊息在帝國統治上的重要角色。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或許是 2015 年 4 月甫去世的劍橋大學教授貝里（Christopher Allan Bayly）探討大英帝國對印度殖民地訊息的掌握。他指出，在印度紛雜多元的社會組成下，各種訊息生產組成傳播方式等構成的訊息秩序（The Information Order），是英國統治成敗的關鍵。[2]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單一強權，以及 911 事件後全球反恐戰爭與利用網際網路的情報作為，「帝國式的安全國家」（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成為何偉亞（James Hevia）等學者的關注焦點。何偉亞指出，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英、法、普魯士等幾個歐洲大國在相互爭戰與帝國主義擴張過程中，敵對國家或者殖民地裡的訊息，開始以各種統計資料、地圖等形式，被有系統地收集與整合，從而發展出常設的軍事情報制度與組織。[3]何偉亞特別指出，當時英國與歐陸各國軍事情報的大部份內容，並非來自攔截的通訊信號或間諜秘密行動，而是來自各國公開出版品。

1 Simon Schaffer, Lissa Roberts, Kapil Raj, and James Delbourgo, eds.,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Sagamore Beach, MA: Watson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LLC, 2009).

2 Christopher Allan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James Hevia,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Building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延續何偉亞的這個觀察，本文將討論：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東亞主要口岸公開出版的商業報紙，成為當時外交領事的重要消息來源。本文將聚焦於著名的 1874 年臺灣事件（中文學界常稱為牡丹社事件），特別是日本、中國相繼出兵臺灣的相關報導與消息，並進一步論證：1870 年代在東亞出現的另外兩種訊息制度與交通技術，分別是沿岸定期輪船航線與連結幾個主要口岸的海底電纜；它們跟公開發行的報紙，共同在東亞沿岸交織出了一個新的跨國訊息溝通模式。[4]以往的研究強調臺灣事件作為東亞國際關係的分水嶺，日本藉此弱化中國對琉球的宗主權，並由此發展出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相關航運史的研究也指出，日本政府藉由臺灣出兵徵集運輸船隻，建立起自身東亞沿岸輪船航運的職能。[5]本文要藉由該事件來說明，在 1870 年代，報紙、輪船、海底電纜這些由海上經濟脈絡發展出來的跨國界的通訊交通技術，在東亞沿岸形成了一種以公開訊息為基礎的訊息流動，各個港口成為知識或訊息生產與流動的主要地點；因此，我稱這個新的通信模式為「港際情報體制」（The Inter-port Intelligence Regime）。

相較於何偉亞將「情報」視為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專業軍事組織崛起的關鍵，本文指出，這一港際情報體制與商業活動息息相關。「情報」一詞非限於「敵對國訊息」的用法，在這些商業報紙上經常可見。例如，報紙上經常以「航運情報」（Shipping Intelligence）或「商業情報」（Commercial Intelligence）作為專欄標題，報導船隻進出某港口的消息或商品行情。[6]筆者的兩篇論文，闡述在海上經濟脈絡裡，十九世紀口岸英文商業報紙中出現的這一還沒被國家「挪用」的情報定義。筆者指出，當時出版的英文報刊是各口岸間訊息流動的

---

4 電報一向是討論「帝國與訊息」的重要課題，如 Paul M. Kennedy, "Imperial Cable Communications and Strategy, 1870-191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6:341 (October, 1971), pp.728-752;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land Wenzlhuemer, *Connect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rld: The Telegraph and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日〕小風秀雅，《帝国主義下の日本海運：国際競争と対外自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6 關於「情報」在二十世紀國家情報組織出現後的定義，參見 Michael Warner, "Wanted: A Defini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of Intelligence*, 46:3(2002), pp. 15-22.

主要媒介，以商人爲主的讀者透過它獲得東亞沿岸的各種消息。[7]該二篇論文著重討論商人與傳教士，本文則聚焦在這些港口活動的英、美等國駐中、日外交人員及媒體報人，揭露他們如何利用或適應這個新體制。臺灣事件以這些人做爲主角的相關訊息流動與報導，在時機點上恰好可以成爲我們檢視這個新體制運作的一個絕佳窗口。

臺灣事件的發生年代，正好是東亞各個主要通商口岸裡，定期輪船、報紙與海底電纜初期匯集的時期。以報紙而言，中、日文報紙在 1874 年左右繼英文商業報紙之後陸續創刊。該事件牽動多方勢力，引起矚目，成爲這些新興報紙的重要新聞之一。如果考量到當時清廷也陸續派兵抵臺，中、日雙方兵力對峙，有一觸即發的態勢，可以說這些臺灣事件的相關新聞，是東亞各港口新興媒體第一次在地的「戰爭報導」。[8]學者西里喜行一系列針對晚清琉球問題新聞的研究，整理分析日本出兵前後三個不同時期的中文相關報導。此外，他也列表整理並全文轉錄 4 份中文報刊上的相關記載。這些報刊出版地涵蓋香港、上海與北京。分別是由「中國近代報業之父」王韜所發行的香港《循環日報》（1874 年 2 月創刊）、上海的《申報》（1872 年創刊）與《萬國公報》（其前身《教會新報》於 1868 年創刊，1874 年改名），以及北京的《中西聞見錄》（1872 年創刊）。[9]

7　拙著，〈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卷 32 期 2（2014 年 6 月），頁 49-82；拙著，〈信任的邊界：1860 年代香港與上海的「港際情報體制」與滙豐銀行的成立〉，已獲審查通過，即將刊登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

8　關於「戰爭報導」的研究與文獻回顧，見 Weipin Tsai（蔡維屏）, “The First Casualty: Truth, Lies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sm in Chi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1(January 2014), pp. 145-163.

9　〔日〕西里喜行著，胡連城等譯，《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日〕西里喜行，〈台湾事件（1871-1874）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一部・第二部，期 33（1988 年 9 月），頁 233-303；期 34（1989 年 3 月），頁 145-180；期 35（1989 年 12 月），頁 31-81。

研究通商口岸中文報業史、出版史的學者皆指出，香港與上海是最爲突出的兩處出版地。[10]然而，西里喜行收集整理臺灣事件相關的 4 份中文報刊，僅有 1 份來自香港（《循環日報》），未包括在日本出兵的 1874 年 5、6 月間已經發行的中文報紙，例如《香港華字日報》〔附屬英文《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館〕、《香港中外新報》〔附屬英文《孖剌西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以及《香港近事編錄》。上海中文報刊的種類與規模，當時均不如香港，除了《申報》外，還有在 1874 年 6 月開始發行的《匯報》。[11]檢視上述幾種報紙的現存殘編，對臺灣事件皆有大篇幅報導。

1870 年代初期剛發行的日文報紙也不遑多讓。陳萱研究 1872 年創刊的日文《東京日日新聞》中有關臺灣事件的新聞，發現號稱日本第一位戰地記者的岸田吟香極具影響力。陳萱指出，「岸田所寫的實況紀錄連載，使得《東京日日新聞》的發行量快速成長 1.5 倍，其專欄〔名稱爲「臺灣信報」〕的內容也爲其他報社爭相轉載、引用。因此，專欄中所提到有關臺灣社會、種族、風俗習慣等內容，不僅爲當時的日本人廣泛閱讀，成爲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也是日本人建構臺灣原住民印象的重要資訊來源」。[12]

和岸田吟香一起參與報導臺灣事件的中國報人，也增進中文世界對臺灣，特別是島嶼南端原住民的了解。本文要進一步指出，這些中、日文文本對臺灣的認識，是奠基於十九世紀東亞沿岸由貿易網絡與新技術條件所建立起來的訊息秩序之上。這一訊息秩序，是以英文報刊爲主的跨語言、跨港口的知識流通。

---

10 如 Frank H. H. King and Prescott Clarke, eds.,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76).

11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15, 1874, p. 551; 卓南生，〈中國最早華文日報新史料的發現與研究：有關「香港船頭貨價紙」及「香港中外新報」的考究〉，《新聞學研究》，集 41（1989 年 4 月），頁 91-103；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錄》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歷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178-185。

12 陳萱，〈牡丹社事件隨軍記者岸田吟香的臺灣原住民紀錄——以「臺灣信報」爲中心〉，《原住民族文獻》，期 18（2014 年 12 月），http://ihc.apc. gov.tw/Journals.php?pid=625&id=823（2015 年 8 月 4 日檢索）；另參考陳萱，《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不只是中、日文各自語言知識的增長，更是一個以英文爲中介，來溝通東亞沿岸各地相關訊息的交錯混雜現象；且參與建立此一秩序，並從中得利的，是那些具有跨語言、跨國界能力的行動者。費南山（Natascha Gentz）注意到最早一代中文報人的這種跨界特質。她指出，受到梁啓超的影響，我們忽略了甲午戰爭前二、三十年間已經出版的中文報刊的重要性。不同於以往將這些第一代中文報人看作對傳統科舉絕望的「無賴文人」，費南山分析 1872 年創刊的《申報》英國老闆美查（Ernest Major）最初僱用的幾位華人編輯，指出他們大多與教會相關且擁有秀才功名，並發現他們多半與 1862 年後因上書太平天國而流亡香港的王韜保持通信。[13]王韜到香港後創辦《循環日報》，並與另一份中文報紙《香港近事編錄》關係密切。[14]這些人際網絡緊密的新興中文媒體，都密集報導這次口岸報紙關注的臺灣事件。

以往對中、日文報刊臺灣事件報導的研究，侷限在單一語言的文本詮釋，不能看出不同語言文本對該事件的傳抄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尤其更忽略了作爲第三方語言、在東亞各主要口岸發行的英文報紙，而這些英文報紙正是臺灣事件新聞跨港口傳播的主要媒介。早在輪船普及與海底電纜引進前，英文報紙就已出現在東亞，成爲現今研究十九世紀前半訊息傳遞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在鴉片戰爭前，怡和洋行創辦人馬地臣（James Matheson）在廣州發行中國境內最早的英文報《廣州紀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以中文能力著稱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曾擔任該報主編，在刊載船期物價等「情報」之外，也翻譯《京報》等與廣泛商情有關的消息。卓南生與岸本美緒發現，鴉片戰爭的消息是透過香港、上海等地與英文報館關係密切的中文報刊，例如《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外襍誌》等，

13 Natascha Gentz, “Useful Knowledg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he Field of Journalistic Produc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47-104.

14 西里喜行指出，上海《申報》的主筆之一錢昕伯是王韜的女婿，美查還曾派他到香港向王韜學習辦中文報。見〔日〕西里喜行，〈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 I）〉，《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集 38（1991），頁 48。

經由「唐船風說」與江南地域社會的人際網絡進入長崎，成爲幕末日本得知洋人情報的重要來源。[15]

隨著 1850 年代日本開國，到 1870 年代，在中、日兩國主要口岸間，英文報紙的發行更爲普遍。中文世界的讀者，較了解香港與上海等地中英文報出版史，此不贅述，僅介紹日本的發行概況：1860 年代起，這些英文報紙主要出現在長崎、橫濱、神戶等開港場的「外國人居留地」。其中最早的是 1861 年長崎的《長崎船期廣告紙》（*Nagasaki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以及同年橫濱的《日本先鋒報》（*The Japan Herald*）。隨後在洋人最多的橫濱，又有《日本公報》（*The Japan Gazette*）、《日本郵報》（*The Japan Mail*）等英文報出版。[16]1876 年《先鋒報》與《郵報》同時發行日報與週報版，這三份橫濱英文報另也出版雙週版或月刊，以便向海外發行。此外，在橫濱還發行有法文《日本回聲報》（*L'Echo du Japan*），以及半月刊《遠東畫報》（*The Far East*），與諷刺漫畫報《日本龐趣》（*The Japan Punch*）等。[17]這些新興媒體加上定期輪船航線與海底電纜，構築這一情報體制的新技術與制度條件。受惠於這些新條件，香港、上海、長崎、橫濱等地英文報，得以頻繁轉載彼此的消息，並翻譯中、日文相關報導與評論。本文將以這些密集的中、英報紙之間的轉載報導爲主，試圖論證這個現象不只顯露當時眾家新興報紙彼此間的競爭與合作，也彰顯十九世紀下半，以英文報紙這種公開的媒體爲基礎的東亞口岸訊息圈。

---

15 卓南生，〈官板華字新聞および中国語原紙について〉，收入北根豐編，《日本初期新聞全集 1》（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頁 v-vii；卓南生，〈中国最初の華字日刊紙の新事実および新説——「香港船頭貨價紙」および「香港中外新報」をめぐって〉，《新聞學評論》，期 35（1986 年 4 月），頁 31-46、296-297。〔日〕岸本美緒，〈鴉片戰爭的消息：從江南到日本〉，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14 年 9 月 29 日。

16 〔日〕鈴木雄雅，〈日本における初期欧字紙について〉，收入〔日〕北根豐編，《日本初期新聞全集 1》，頁 ix-xi。

17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s Empire* (New York: 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76), p. 352.

二、從巴夏禮、威妥瑪到總理衙門

在 1870 年代東亞通商口岸的世界裡，報紙作爲當時唯一媒體，其刊載的訊息跟今天一樣，黨派偏見與錯誤訛傳皆有，但這唯一的公開媒體，卻是外交領事重要的消息來源。中、日兩國口岸英文報紙，在日本出兵臺灣之前，就已成爲英、美外交官獲知日本政府意圖與相關兵力集結行動的重要管道。相關外交官員向母國的正式報告裡，常見到剪貼報紙的報導。例如，在日本出兵臺灣前不久的 1874 年 3 月，英國駐日本公使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就直接剪貼橫濱英文報《日本郵報週刊》（*The Japan Weekly Mail*）上一篇文章，向英國外交部回報日本國內征韓浪潮下一則與眾不同的反對意見。該篇報導原是以日文刊於江戶日文報《日新眞事誌》，指出日本國內對征韓仍有反對意見，加上戰爭準備不足、軍隊訓練不夠等因素不宜出征，以免重蹈 1870 年普法戰爭法國失敗的覆轍。[18]但不到一個月，巴夏禮就發現日本政府爲安撫武士階層的征韓情緒，更改了原先已經決定放棄的懲罰南臺灣原住民計畫，而將矛頭轉向臺灣。[19]在此之前，巴夏禮曾二度剪貼日本英文報紙對 1873 年的年度大事回顧，回報給英國外交部；其中，日本國內的征韓風潮與副島種臣出使中國商議生番殺人一事，皆被當作年度大事提及。[20]這種直接剪貼駐在國英文報紙向母國回報的方式，常見於同時期英、美兩國在東亞的外交文書。

---

18 "War with Corea," *The Japan Weekly Mail* (Yokohama), Feb. 28, 1874, p. 170, Incl. in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No.44, March 9, 1874, in *MS British Foreign Office: Japan Correspondence, 1856-1905: Japan, Section II, F.O. 46/1-104, 1868-1890*（以下簡稱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7, pp. 248-252. 原載於《日新眞事誌》，1874 年 2 月 24 日。

19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No.61, April 6, 1874,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8:1, pp.99-105; 日本政府原先打消念頭的回覆來自岩倉具視，同時也包含日本政府對朝鮮與俄國（關於庫頁島）的最新意向，見 Parkes to Granville, No.91, Nov. 3, 1873,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68, pp. 188-205.

20 "1873," *The Japan Weekly Mail* (Yokohama), January 17, 1874, pp. 42-43, Incl. in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No. 5; Jan. 18, 1874,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6, p. 75; "1873," *The Japan Mail* (Yokohama), Jan. 23. pp. 34-43, and "1873," *The Japan Weekly Mail* (Yokohama), Jan. 24, 1874, pp.

在不同口岸發行且彼此聲氣相通的英文商報，不只成爲「說英文的」（Anglophone）英、美兩國領事們便捷的消息來源，也成爲報館彼此間查證消息的憑據。例如，1873 年日本外相副島種臣出使北京時，日本政府出兵臺灣的倡議，已在當時東亞的英文報紙消息圈裡廣泛流傳。1873 年 4 月 2 日上海《申報》刊出一篇〈譯東洋報論欽使來議臺灣兇事〉，內容爲副島已由橫濱出發抵達上海，預計前往北京，要求中國政府依 1871 年琉球宮古島人的船難難民被殺事件，對南臺灣的原住民做出懲處；《申報》並表示這篇報導是譯自日本的「西字新報」。1873 年 3 月 31 日上海的《字林西報》與 4 月 3 日的《北華捷報》這兩份英文報紙，也轉載同篇文章，並指出該文其實來自橫濱英文報《日本郵報》3 月 22 日的一篇報導。[21]香港的英文日報《孖剌西報》也轉錄這則消息。[22]上海《申報》編輯即根據香港報紙的報導來判斷消息的正確性：「前所記東洋之事〔指副島出使中國議處生番殺人一事〕，頗疑其屬子虛。今閱香港中外新聞亦載此事，與本館所言大略相同，或者確有其事亦未可知」。[23]同一篇有關日本的英文報導，被上海、香港的中、英文報紙翻譯、轉載，並且在不同港口間受到多方查證，不只顯露出當時東亞沿岸訊息流通的管道、方向與時間，更顯示出本文所要強調的港際情報體制的公開、可相互對比的特點。

這類不同港口間報紙的相互參照，也反映在日本 1874 年春天出兵前相關集結行動的報導上。橫濱的英文報紙《日本郵報週刊》，在 1874 年 2 月 28 日轉載神戶英文報《兵庫新聞》（*The Hiogo News*）的一篇報導，指出神戶當地：

> 持續充斥著關於西南亂事的謠言，大約 70 名軍官於週一搭乘北海丸〔*Hokkai-Maru*〕抵港，其中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當晚就轉赴大阪；美國萬昌輪船公司的輪船紐約號，也於昨天開往〔大阪的〕天保山〔港〕

59-60, Incl. in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No.15, Jan. 27, 1874,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6, p. 253-260.

21 "Yokohama,"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March 31, 1873, p.295; also reprinted in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April 3, 1873, pp. 291-292; 轉引自"A Mission to China," *The Japan Mail* (Yokohama), March 22, 1873, p. 176.

22 "Yokohama,"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March 26, 1873.

23 〈日本使臣來中國理論臺灣生番殺琉球人事〉，《申報》，1873 年 4 月 9 日，第 3 頁。

去運載兵士，據聞將開往筑前的博多港。本來預計前往長崎的航程因而耽擱。謠言指出大阪當地的兵士曾抗命，但本報館並沒有可靠的消息來源可以證實。也提醒讀者不要輕易相信現今各種傳言。除了長崎與下關之間可能發生了甚麼重要到要調動軍隊往西南的事情外，其餘一無所知。

就在上述消息排版之後，本館收到大阪通訊員的電報告知，來自大阪城一支人數超過 1,000 的軍團，昨晚開拔登上天保山的幾艘輪船。〔其中之一的〕紐約號今晨四點回到本〔神戶〕港，搭載大久保與超過 600 名的兵員，加上〔北海丸的〕70 名軍官之後，該船〔紐約號〕於上午 7:30 啟程，經由博多前往長崎。北海丸於昨晚北上大阪。[24]

美國萬昌輪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的紐約號輪船，是臺灣事件中日本調動兵力的主要船隻之一。這些報紙雖然報導軍隊的大規模調動，但同時間還有已進入尾聲的佐賀之亂，報導者當時並不知道日本政府的眞正意圖不在平亂。到了 1874 年 3 月 7 日，《日本郵報週刊》在報導佐賀之亂即將平息的同時，最早披露日本政府將征臺計畫付諸實行。該報指出，根據可靠消息，近日將有一個新的、前所未料的政策宣布，該政策「將平息反亂黨派的不滿，將他們憤怒導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渠道」。[25]

相較於橫濱的英文報嗅出日本政府征臺之議再起的政策轉向，1874 年 3 月香港發行的中文《循環日報》卻未如此敏銳。該報指出，日本政府自 1874 年初以來大量租賃、購買英美輪船，並將日本政府的意圖解讀成是爲出兵九州，平息當地反亂。例如：3 月 6 日，該報登載「日本朝廷特賃美國公司火船紐約，以載兵士」，但卻將紐約號載運兵士，解釋爲日本政府平定佐賀之亂的尾聲，任務目的是「橫截海面，以當要衝。凡有往來長崎、大坂〔阪〕之人，

24 *The Japan Weekly Mail*, Feb. 28, 1874, p. 163.

25 原文爲 “to appease the discontent of the insurgent party and divert their anger in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channel,” *The Japan Weekly Mail*, March 7, 1874, p. 181.

必細加查驗，而後許行，蓋恐其旋鄉作亂也」。[26]又例如，該報評論舊金山英文報紙《曰嘉釐符尼亞》（*Alta California*）上日本政府意欲強化日本海上運輸能量的兩則消息。其一是日本政府欲比照美國政府，以相同金額補助萬昌輪船公司，強化其舊金山──日本──香港的航線；其二是日本意欲盡購美國的明輪輪船。《循環日報》日報的主編認爲，這兩項計畫都需龐大資金，日本政府在日前平亂耗損下恐怕力有未逮，未能預料到日本的船隻徵集，另有他用。[27]

日本政府大量購買、租賃輪船的消息，受到注重航運消息的英文商報的矚目，其消息源頭除上述的舊金山英文報外，也來自日本的英文報。1874 年 2 月，《日本郵報週刊》轉載橫濱《日本公報》的一篇讀者投書。該文細數停泊江戶港內十幾艘日本政府已買下或訂購中的西洋輪船，並評估該年春天起日本政府將具備輪船運送大軍的能力。[28]對各國駐日領事具有情報價值的訊息，就這麼公然地在報紙上討論。儘管日本政府具備輪船運兵能力已是眾所皆知，但 1874 年 3 月之前日本政府將國內兵力往長崎集結，隱蔽征臺意圖（指標意義的「臺灣番地事務局」於 4 月 4 日才成立），還是誤導了英國駐日公使、神戶英文報和香港中文報。

隨後日本政府正式「對臺宣戰」的消息，也是由媒體所披露。[29]橫濱的《日本公報》在 1874 年 3 月 30 日，獨家刊載以下的新聞：

> 今天上午，太政官〔Daijokuan〕通知了陸軍省與海軍省，表示日本已向臺灣島宣戰〔WAR HAS BEEN DECLARED by Japan against the Island of Formosa〕。[30]三艘船隻將立即啟航前往芝罘〔今山東煙台〕，與已在當地的另一艘船會合後，前往臺灣。一萬五千名士兵也將旋即派遣。

26 《循環日報》，1874 年 3 月 6 日。

27 〈論所言日本事之不可信〉，《循環日報》，1874 年 4 月 8 日。

28 *The Japan Weekly Mail*, Feb. 14, 1874, p. 119.

29 日本政府征臺政策確定的相關日期，見〔日〕石井孝，〈台灣遠征計画の具体化〉，《明治初期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橫濱：有隣堂，1982），頁 29-47。

30 英文大寫處爲原文標註強調。

香港《德臣西報》、《孖剌西報》、《循環日報》，與上海《字林西報》、《申報》、《北華捷報》、《教會新報》等報刊，都轉載了這篇報導，轉載日期依序是 4 月 7 日、8 日、10 日、13 日、14 日、18 日及 25 日。[31]香港與上海之外，《福州先鋒報》（*The Foochow Herald*）也轉載了這則消息。[32]香港方面得到消息的管道，應該是 3 月 31 日離開橫濱，並於 4 月 7 日抵達香港的法國火輪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門札萊號（*Menzaleh*）輪船。[33]《德臣西報》之所以較《孖剌西報》早一日刊出，是因爲該報爲晚報，而後者爲日報的緣故。上海離橫濱較香港近，卻比香港晚 6 天才刊出。對照《字林西報》上的船運消息，推測是橫濱上海間輪船航班的限制。[34]儘管因交通條件而在日期上有幾天的差距，但總的說來，這個在東亞幾個口岸間流傳的日本出兵消息，大都比北京方面得知這個情報的時間（4 月 18 日，詳下）爲早！

《日本公報》3 月 30 日這篇被廣爲轉載的「宣戰」消息，開啓此後幾個月中、日通商口岸報紙對臺灣事件密集且相互引用的訊息迴路。然而，對照日本臺灣出兵相關研究看來，該篇報導誇大的成分極重。更離奇的是，「臺灣島」在當時並非是個主權國家，日本政府宣稱要討伐的對象，是臺灣南端殺害琉球船難難民的幾個原住民部落，而非對全島宣戰。同樣也在橫濱發行的《日本郵報週刊》針對《日本公報》的該則消息，淡定地表示「臺灣遠征可能成行的消息，一直以來眾所皆知。3 月初〔本館的〕《日本郵報》就已報導今春以來的相關消息。但這不能合理化上述用語〔《日本公報》的『對臺灣島宣戰』字眼〕。

31 《循環日報》，1874 年 4 月 10 日，可能受限於材料，西里喜行的前引文章裡，收錄最早《循環日報》「臺灣事件」相關報導，是 1874 年 5 月 19 日的〈台灣風俗考五〉（頁 256）。然而，自該年（1874）2 月 4 日起發行的該報，在此之前已有數篇相關報導；〈東洋來報〉，《申報》，1874 年 04 月 14 日，期 599，頁 2；〈大日本國事．舉兵伐生番〉，《教會新報》，卷 6 期 283（1874 年 4 月 25 日），頁 231。此外，4 月 8 日香港的《香港時報》（*The Hong Kong Times*），也刊載了《日本公報》的這則消息，然而，卻將原刊日期標明爲 3 月 28 日。

32 《福州先鋒報》的轉引，見 *The Japan Gazette*, May 6, 1874.

33 “Shipping: Arrivals,” *The China Mail*, April 7, 1874.

34 從橫濱運送《日本郵報》到上海的輪船，應該是 4 月 12 日抵達上海的阿坎達號（*Acantha*），見“Shipping Report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pril 13, 1874, p. 336. 該船於 1874 年 2 月左右，與萬昌公司簽約，負責轉運萬昌從舊金山運到日本的郵件到上海，見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rch 9, 1874, p. 219;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2, 1874, p. 221.

因爲它將誤導不了解臺灣島與中華帝國關係的讀者」。[35]《日本郵報週刊》的編輯於 5 月 9 日，日軍已登陸南臺灣後，繼續批評他的橫濱同業。他援引《字林西報》4 月 23 日的社論，認爲《公報》所用的「戰爭」一詞言過其實。而《公報》所宣稱的，日本將派兵 1 萬 5 千人是誇大的數字，如同《公報》前此宣稱日本征韓將有 4 萬名兵力一樣。《郵報》編輯提醒讀者，不要相信任何《公報》用大寫表示的任何說法！[36]簡言之，這樣的報業的競爭，顯示出報館可能的捕風捉影，卻也透露了日本政府的出兵意圖與其行動準備。

輪船買賣和運輸向來是東亞各口岸英文商報重要的報導內容。自 1874 年初起中、日港口報紙裡登載許多日本政府租用多艘輪船且不清楚眞正目的之報導，引起英國公使巴夏禮的嚴重關切。他在 1874 年 4 月 2 日主動詢問日本新任外務卿寺島宗則：日本政府是否將出兵臺灣？寺島告訴巴夏禮，這支遠征軍將包含幾艘船與一千名左右正規部隊的軍力，並附帶幾名工匠，以便萬一有必要長駐臺灣時，能夠建造部隊的房舍。[37]巴夏禮之所以主動向日本政府詢問，除因爲《日本公報》做了聳動報導外，日本在港口之間徵集調度兵力物資的動作非常明顯，各類英文報紛紛報導。換言之，日本政府大量依賴輪船運送兵員錙重糧餉到長崎的兵力調動過程，已爲東亞各口岸英文商報所注意；亦顯示日本政府海上運輸能量（capacity）不足，只能憑藉向英、美兩國租借或購買的輪船。

輪船與報紙是 1870 年代港際情報體制裡兩項重要的元素。這些報紙設定的讀者以商人爲主，因此刊載的內容大半與輪船運輸的商業活動息息相關。船隻抵達日期、預計開航時間、船長、船公司等資訊，在報上一目瞭然。當時東亞沿岸的輪船航運爲美、英、法等國商人主導，建立往來東亞沿岸各港口間的定期航線與商業貿易。最早進入東亞輪船航運市場的，是著名的大英火輪船公

35 *The Japan Weekly Mail*, April 4, 1874, p. 253.
36 *The Japan Weekly Mail*, May 9, 1874, p. 362; 引《字林西報》社論，1874 年 4 月 23 日。
37 Parkes to Earl Granville, No. 61, April 6, 1874,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8, pp. 99-107.

司（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38]該公司在 1845 年開辦錫蘭到香港的航線，1850 年開辦香港——上海航線。跟本文相關的是該公司 1859 年起的上海——長崎航線，以及 1864 年起的上海——橫濱航線。[39]法國政府特許的法國火輪船公司則在 1865 年開辦上海——橫濱航線。美國商人則從太平洋的另一端，設立上文提及的萬昌郵輪公司。該公司於 1867 年起，開辦了從舊金山經橫濱到香港的定期航線。[40]英、法、美等國輪船公司經營東亞航線起步較早，1874 年臺灣事件時，中、日兩國官方扶植的輪船業，不是在初創期（如 1872 年創辦的中國輪船招商局），就是還在籌辦（日本三菱輪船會社在 1875 年開辦）。[41]這些定期輪船航線除運貨、載人之外，也承攬各國政府委託的郵務。因此，各口岸的報紙透過這一網絡彼此轉引、比較消息內容深度、準度與相關評論。1871 年起，幾個主要口岸之間，開始有海底電纜的連結，但或許是成本太高的緣故，不同港口報紙的新聞轉引，往往還是透過輪船郵遞，因此東亞沿岸的當地大部份新聞轉引，往往有數天到一星期的時間差。

這種輪船定期航線使報紙的傳遞迅速且方便，讓口岸英文報成為中國官方高層得知日本出兵的消息管道之一。日軍首批部隊登陸南臺灣的日期是 1874 年 5 月 8 日。從中文史料得知，英國駐中國使臣威妥瑪在 4 月 18 日告知清廷

38 該公司通常在英文史料裡簡稱 P. & O.，或稱鐵行輪船公司。

39 大英火輪船公司（鐵行輪船公司）早期的歷史，見 Freda Harcourt, *Flagship of Imperialism: The P. & O. Company and the Politics of Empire from Its Origins to 186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英國政府於拿破崙戰爭後開始補助幾家輪船航運公司的歷史，參見林志龍，〈十九世紀以來英國遠洋定期航線與政府補助的發展〉，《新史學》，卷 17 期 2（2006 年 6 月），頁 219-236。

40 〔日〕小風秀雅，《帝国主義下の日本海運：国際競争と対外自立》，「主要定期船会社アジア航路開設年表」，頁 16。關於萬昌公司初期歷史，可見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A Sketch of the New Route to China and Japan by 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s through line of steamships between New York, Yokohama and Hong Kong, via the Isthmus of Panama and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Turnbull & Smith, Book and Job Printers, 1867).

41 劉廣京、黎志剛等學者已有許多招商局史的研究，晚近的中文作品見黎志剛，《黎志剛論輪船招商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三菱輪船會社的成立史，特別是其與臺灣出兵的關聯，見〔日〕成田誠一，〈台灣出兵と三菱〉，《三菱人物傳．岩崎彌太郎物語》，Vol. 12, 三菱集團官網，https://www.mitsubishi.com/j/history/series/yataro/yataro12.html。（2015 年 9 月 17 日檢索）

總理衙門日本即將出兵的消息。[42]蔣廷黻在他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裡記載，該項消息清廷「最初得自西人，且半信半疑」。[43]當時負責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弈訢也承認，日本確定出兵的消息最早來自洋人。除了威妥瑪外，其他幾位在北京的洋人也是清廷的消息來源，例如隨後兩天（4 月 19、20 日）通報同一消息的有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William S. Frederick Mayers）、法國翻譯官德微里亞（Gabriel Déveria）、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西班牙使臣丁美霞（F. Otin Mésias）等。此外，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與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李宗羲，也分別上稟日本出兵消息。「新聞紙內所敘日本興兵赴臺灣各節」、以及「新聞紙內敘及」如「日本在長崎購買輪船，租雇商船，裝載軍裝、糧餉」等出兵前準備工作，成爲這些中外官員通報清政府的依據之一。[44]打狗關代理副稅務司愛格爾（Henry Edgar）是赫德的表親，他指出日本將出兵 1 萬 5 千名，與《日本公報》3 月 30 日的誇張數字一樣，或許消息來源也是報紙。[45]這個數字與巴夏禮 4 月 2 日從日本外相那得知的 1 千人左右相去甚遠。

「新聞紙」的消息，更成爲相關官員進一步行動的根據。報上流通日本官員在各通商口岸積極購買、租賃輪船的消息，除了讓巴夏禮主動詢問日本外務卿，明確得知日本政府出兵的意圖之外；還下令橫濱、神戶、長崎等地英國駐日領事，要求英國船隻嚴守中立，不得超出日本國境外去運載日軍人員、武器、

42 〈弈訢等奏日本兵船現泊廈門請派員查看摺〉，三月二十九日（1874 年 5 月 14 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下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93，冊 10，頁 3734-3736。

43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31），中卷，頁 106-107。

44 〈弈訢等奏日本兵船現泊廈門請派員查看摺〉，三月二十九日（1874 年 5 月 14 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3，冊 10，頁 3734-3736；〈弈訢等奏日本兵船赴臺請飭前派大員速籌對策摺〉，四月十四日（1874 年 5 月 29 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3，冊 10，頁 3744-3746。

45 〈弈訢等奏日本兵船赴臺請飭前派大員速籌對策摺〉，四月十四日（1874 年 5 月 29 日），同前書，頁 3744-3746；〈李鶴年奏日本兵船欲攻臺灣番境相機妥籌摺〉，四月十六日（1874 年 5 月 31 日）同前書，頁 3747-3748。愛格爾的簡歷，見 Chen Xiafei and Han Rongfang, eds.,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74-1907*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3), Vol. IV, p. 6.

糧餉。如果發現日人向英國人洽商上述事宜，必須嚴加看管，並且向他回報。[46]威妥瑪之所以能領先各國公使告知清廷，依靠的正是巴夏禮。在詢問過日本外相後，巴夏禮在 1874 年 4 月 4 日當天乃利用 1871 年舖設的中日之間的海底電纜，拍發電報給威妥瑪。電報由長崎傳至上海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與其父、著名的新教傳教士麥都思同名），再由上海轉至北京。由於當時清廷對電報仍持拒斥態度，中國境內尚未有電報線，上海到北京還得靠輪船或其他交通方式傳遞，以致該電報抵達北京已經是 4 月中旬。這封原本加密的電文內容如下：

> 日人忽然派出海軍船隻與至少兩千名的兵力前往臺灣，表面上宣稱是要對付南端的野蠻人，實際上準備佔領。不確定他們是否將、或能繞過中國領土。中國政府有任何新聞或消息，或日人洽詢外國運輸船，立即向我回報。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與其他幾位美國軍官與遠征軍同行。[47]

拍發電報的同時，巴夏禮也向威妥瑪寄出一封信，敘述更多重要細節。例如出兵目的是為了平息日本國內武士階層的不滿情緒、日軍預計在 4 月底登陸臺灣、指揮官是「較年輕的西鄉」（相較於西鄉隆盛）等。[48]巴夏禮更利用長崎經由上海到香港的海底電纜，拍發電報到香港給英國海軍中國站總司令薛德衛（Admiral Sir Charles Shadwell），要他緊盯日軍的海上行動，並提醒他日軍裡有美國軍官顧問。[49]

---

46 Parkes to Her British Majesty's Consuls at Kanagawa, Hiogo and Nagasaki, April 4, 1874,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8, pp. 107-108.

47 Parkes to Wade, April 4, 1874,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8, pp. 109-113.

48 巴夏禮在信中未指出指揮官是西鄉從道，而只用括弧表明是「較年輕的」（the younger）西鄉，而不是較有名的西鄉隆盛。英文報紙在大部份的場合，僅只寫出遠征軍的將領西鄉（Saigo），但在另一些場合也能辨明這個 Saigo 是另一個西鄉〔在英文報上的名字通常是吉之助（Kichinosuke）〕，即西鄉隆盛的弟弟。見 *The China Mail* (Hongkong), April 15, 1874, 引 *The Japan Gazette* (Yokohama)的報導，以及上海《字林西報》（May 28, 1874, p.491）引江戶《日新眞事誌》報館發行的英文週報《東京週刊》（*The Tokei Journal*）的報導。

49 Parkes to Shadwell, April 4, 1874,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8, pp. 114-117.

透過報紙對日本出兵準備的報導，歐美等國駐日公使們，也參考彼此的因應做法。例如，巴夏禮要求英國臣民與輪船公司嚴守中立的同時，透過日本英文報紙，得知當時英國在東亞的主要外交競爭對手俄國，也要求俄國人與俄國船隻嚴守中立。[50]橫濱《日本每日先鋒報》（*The Japan Daily Herald*）則贊成英、俄兩國公使的中立立場，1874 年 4 月 17 日的社論指出，日本出兵登陸臺灣，是對清朝政府具敵意的舉動，將成爲中國對日本的開戰藉口（*casus belli*）。文中直指美國駐日本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看來與駐日其他所有各國公使們直接作對，放任美國船讓日本徵用來出兵臺灣。平安在隔日（18 日）立即針對此報導發出抗議信。與引薦李仙得給日本政府的前任美國駐日公使德朗（Charles E. De Long）的立場迥然不同，平安在公開信中呼應英國公使巴夏禮，下令美國籍船隻嚴守中立；更要求日本外相立即說明日本的眞正目的。[51]此處討論英、俄、美等國駐日公使利用報紙的出兵相關消息和輿情的收集、回報與進一步行動，下一節將論述日本出兵前的情報準備，也與外交領事人員在港際情報體制裡的行動有關。

三、李仙得的臺灣知識、海上安全與港際情報體制

日本遠征軍的這一群美國軍官顧問裡，巴夏禮特別指名的李仙得將軍，前不久才從美國駐廈門暨臺灣領事的職位卸任。許多相關研究已表明，李仙得是日本出兵臺灣的關鍵人物。他在廈臺領事任內對臺灣的親身調查與相關資訊的蒐集，包括中國朝廷乃至地方官對臺灣周遭海難事件因應的態度作爲，成爲日

50 “Notice,” in the *Japan Mail*, April 11, 1874, Enclosure 5 in Parkes to Granville, April 13, 1874, in *FO: Japan Correspondence*, Vol. 178, p. 151; 巴夏禮回報俄國公使的禁止令的同時，揶揄俄國駐日代理公使（Chargé des affaires）根本沒有任何行政手段，得以執行自己發出的禁令。

51 Bingham to Terashima, April 18, 1874, incl. in Bingham to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s, No.76, April 22, 1874, in *MS Despatches from U.S. Ministers to Japan, 1855-1906*, Volume 28, no page number; 該篇報導爲“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he Japan Daily Herald*, April 17, 1874.

軍出兵臺灣的重要憑藉。[52]學者指出李仙得的臺灣知識對日本出兵的情報價值極高，李所提供的 1870 年繪製的臺灣全島地形圖，詳細記載了「具有潛在軍事功能的海港與地質資源……日本軍隊指揮官利用李仙得繪製的現代台灣地圖，可以事先做好準備，知道那裡可以停泊軍艦，駐紮營地；何處居民可以合作，兼做密探；至於深藏在內山叢林，涉嫌殺害琉球島漂民的高士佛社和牡丹社人，更在地圖上標示準確的座落」。[53]換言之，在美國內戰結束後來到東亞擔任外交領事的李仙得將軍，體現了何偉亞所指出的，那種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發展出的「軍事——外交機關」（military-diplomatic apparatus）對情報的敏感。[54]

本文指出，這一軍事外交機關在十九世紀東亞的實踐，緊扣著當時海上商業脈絡。李仙得的廈門領事任期從 1866 年到 1872 年。1871 年出版的這張臺灣地圖，是其年度（1868-1869）貿易報告結尾的附錄。[55]該報告是（美國）政府公開出版品，因此這張地圖在「港際情報體制」裡迅速流傳。1871 年 7 月，上海《字林西報》就公開評介該報告，盛讚書裡的該張地圖爲有史以來第一張臺灣地形圖。該報評論指出，臺灣氣候溫暖、土壤肥沃，適合各種亞熱帶甚至溫帶植物的生長；廣袤的森林可以提供木材與極具經濟價值的樟腦；且有煤礦、硫磺甚至石油等富饒的資源。這使得臺灣即使不能稱上黃金國度（Eldorado），也堪稱擁有無盡財源。李仙得的全島地圖，將這些物產資源標

52 李仙得的手稿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已於 2012 年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兩位編者費德廉（Douglas L. Fix）與蘇約翰（John Shufelt）有極詳盡的引言與註解。見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eds. 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該書以下省略編者。

53 陳秋坤，〈土著的盟友，台灣的敵人：李仙得〉，收入〔美〕李仙得（Charles Willian Le Gendre）著，黃怡譯，《南台灣踏查手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12），頁 6-11。

54 James Hevia,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pp. 17-20. 關於「軍事——外交機關」，何偉亞在 2013 年 5 月 8 日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演講，進一步闡述作爲近代「國家治理」成分之一的這一知識旨趣面向；內容見何磊譯，〈帝國安全視野中的亞洲問題〉，https://site.douban.com/202478/widget/articles/12352650/article/33022145。（2016 年 7 月 1 日檢索）

55 Charles W. Le 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示地非常詳盡。[56]有關南臺灣原住民的相關知識，只是這一地圖顯示出來的臺灣整體知識中的一環。

這些臺灣情報積累，固然源自李仙得多次因 1867 年 3 月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事件到臺灣調查、接觸南臺灣住民的成果，但這些相關知識也是在港際情報體制的制度與技術脈絡裡產生，為口岸社群有意或無意匯集的智慧結晶。而十九紀中葉口岸聲息互通的報紙，則是這些知識彙整的平台。這些臺灣知識／情報不只成為日軍登陸後行動的指引，更是日本政府跟中國交涉的理據來源。其中，海上航行安全議題，始終是口岸洋人社群與英文商業報紙關心的焦點，也成為日本政府在李仙得的顧問之下正當化出征行動的主要輿論理據。

香港《德臣西報》在羅發號事件初期，曾反應這種口岸洋人社會的海上航行安全論述。這篇香港英文報對羅發號事件的首篇報導，不僅被美國駐香港領事艾倫（Isaac J. Allen）剪貼在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也被李仙得收錄在他的《臺灣紀行》裡。[57]該文是來自臺灣打狗（高雄）的一封讀者投書，內容主要敘述英國駐臺灣代理領事與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乘坐打狗一艘英國軍艦，前往恆春試圖營救可能還遭原住民挾持的生還者。不幸的是，一行人遭到原住民攻擊且一無所獲。該投書最後強調，這次海難不只事關英、美，呼籲所有與中國有商業與官方往來的國家都應正視。該篇投書赤裸地表示，在此行展現和平與友善行動的失敗後，剩下能做的只能是懲罰兇手，如果他們（指殺害羅發號船員的原住民）能被「清光」（be cleared out），在該地代之以中

56 The Editorial,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31, 1871, p. 8831; also reprinted in "Formos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4, 1871, p. 578. 該份地圖也收錄於《李仙得臺灣紀行》中。見〔美〕李仙得（Charles Willian Le Gendre）著，〔美〕費德廉（Douglas L. Fix）、〔美〕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Charlotte Lo）、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本書下略為李仙得，《臺灣紀行》。Douglas L. Fix, "'A Highly Cultivated Country': Charles W. Le Gendre's Mappings of Western Taiwan, 1869-1870," 《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3（2011 年 9 月），頁 1-45。

57 "Wreck of the 'Rover' off Formosa," *The China Mail* (Hongkong), April 6, 1867, in Isaac J. Allen (U.S. Consul in Hong Kong) to William H. Seward (U.S.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7, 1867, in *MS 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Hong Kong, China, 1844-1906,* Vol.6, pp. 44-45;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pp. 252-253.

國人的聚落，則將對商業大有助益。這種商業航行安全利益至上的說詞，成為此後口岸報紙的主流論述。驅逐臺灣南端原住民代之以漢人聚落，也是李仙得向中、美官方建議的解決方案。

除了駐臺灣英國領事與打狗英國軍艦的人道救援外，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也積極處理羅發號事件。他從在臺灣的英國商人麥斐兒（McPhail）的信得知羅發號遇難消息後，乘坐美國軍艦亞舒羅特號（*Ashuelot*）經由安平前往瑯璚灣（車城）。這位通風報信的英商——在打狗、府城設立的天利行（Messrs. McPhail & Co.）——向來代理怡和與顛地（寶順）洋行在臺灣的生意。[58]該行另一位英國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是李仙得隨後幾次臺灣之行主要的翻譯。1866 年必麒麟離開海關（安平分關稅務司）的工作後，轉任天利行。[59]他橫跨海關與洋行的工作經歷，以及對中國官話與閩南話的嫻熟，使其成為多次南臺灣洋人船難後續處置的關鍵人物，受到通商口岸英文報紙的關注。除了協助李仙得與南臺灣原住民接觸之外，必麒麟也於 1870 年協助打狗海關稅務司許妥瑪（Thomas Francis Hughes），到南臺灣救援另一起船難人員。許妥瑪標題為「拜訪十八番社首領卓杞篤」（Visit to Tok-e-Tok, Chief of the Eighteen Tribes）的報告，被李仙得收錄於《臺灣紀行》裡，並明確標出該文來源是 1871 年 1 月 31 日的《海關公報》（*Customs Gazette*）。[60]上海《字林西報》在 1871 年 2 月全文轉載許妥瑪這份打狗海關貿易報告的附件。[61]

58 Le Gendre to Seward, April (date unknown), 1868, in *MS 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Amoy, China, 1844-1906*, Vol. 3, pp. 208-209；葉振輝，〈天利行史事考〉，《台灣文獻》，卷 38 期 3（1987 年 9 月），頁 41-45。

59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f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 p. 7. 根據必麒麟這本自傳性質的作品，他在福州關任鈐字手（tidewaiter）的時候，由於福州話的語言能力，受到赫德的賞識。

60 李仙得，《臺灣紀行》，頁 301-307。英國人許妥瑪（Thomas Francis Hughes）1865 年 4 月進海關服務，1874 年 10 月升任頭等幫辦。參見海關〈新關題名錄〉：“Service List, 1 August, 1875,” in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ed.,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4*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5), p. 221.

61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 3-8, 1871; 費德廉與蘇約翰指出，該文最早出版在 1870 年 5 月的 *The Cycle: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Review* 中，見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p. 307, footnote 5.

在 1874 年臺灣事件發生期間，該文再度被東亞口岸英文報紙廣泛轉載。[62]以報紙這一公開媒體爲基礎，港際情報體制得以受益於或嘉惠於海關官員、洋行商人，與李仙得、巴夏禮等外交領事。在報紙的公開平台上，臺灣開港前後歷次船難交涉述及的臺灣各種知識得以積累，並在不同讀／作者群之間交換。除了這份貿易報告的附件，海關其他的公開資訊，如各關年度貿易報告、幾個主要關口的醫療報告（*Medical Reports,* 通稱《海關醫報》），都成爲上海或香港報紙上被公開評介的文本。

李仙得等外交領事人員關於臺灣的瞭解，或更精確地說，對南臺灣原住民的知識，也是在這種以報紙爲平台的公共文本中衍生。當時福州的一份英文報紙，就已意識到這種經由各式接觸導致知識增長的脈絡。1867 年 10 月《福州廣告紙》（*Foochow Advertiser*）在報導李仙得已說服臺灣道派兵 500 名前往瑯璠懲番時，評論指出「一些好處已從這些野蠻人的幾次惡行中產生，跟之前比起來，臺灣更爲人所知」。[63]《德臣西報》的另一篇報導，附和那位打狗讀者的看法，建議對「兇番」進行懲處。稱許李仙得「敦請」清朝官方出兵的作爲，認爲可以成爲各國領事處理船難的典範。上海的《字林西報》也呼應香港報紙的這個意見。[64]李仙得更在 1868 年 4 月與卓杞篤訂立協議，將來船難難民以紅旗爲號，將受到保護。[65]在一連串羅發號相關事件的報導中，《德臣西報》似乎再度領先通商口岸的其他報紙同業，除了報導李仙得與卓杞篤的會面與「簽約」外，1873 年該報關於卓杞篤的死訊報導與評論，相繼被北華捷報

62 如 *The Japan Weekly Mail,* April 4, 1874, pp. 263-266; 以及 *The Japan Mail,* April 7, 1874, pp. 216-218.

63 這篇福州報紙的報導，來自上海《字林西報》與《北華捷報》的轉載， “Formosa,”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ctober 11, 1867, p. 3415; “Formos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2, 1867, p. 300.

64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25, 1871; “Amoy and Formos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8, 1871, pp. 562-563.

65 Le Gendre to Seward, April 12, 1868, in *MS 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Amoy, China, 1844-1906,* Vol. 3, pp. 444-451.

館的兩份報紙轉載。[66]到了日本出兵臺灣的 1874 年，李仙得因此能在這個知識生產的基礎上，以及必麒麟等人的協助下，多次親自到訪臺灣，完成堪稱臺灣百科的《臺灣紀行》。

在通商口岸的輿論圈裡，李仙得在 1870 年代初成爲通商口岸輿論圈的臺灣通，這使得他在 1872 年年底受聘爲日本政府的臺灣事務顧問。受聘的消息與他隨後的每一步行動，都受到口岸報紙的關注。例如李在 1873 年隨行副島種臣出使北京，[67]就連 1874 年李仙得因參與日本出兵行動違反美國政府的中立政策，而在 8 月 6 日遭到後任的美國駐廈門領事拘捕一事，上海的《字林西報》在隔天就接獲來自廈門的電報。[68]而香港與上海的報紙的後續報導，裡面更附有李仙得本人針對逮捕的抗議信。[69]橫濱的《日本郵報週刊》也在 8 月 8 日報導，接到來自廈門的電報，指出李仙得被駐紮該港美國海軍砲艇上的一隊陸戰官兵上岸拘捕。[70]從廈門發往上海與橫濱關於李仙得被捕的電報，被長期以來關注海上安全的口岸報紙公開刊載，體現港際情報體制的運作。

在李仙得被捕時之前，日本已於 5 月初登陸南臺灣。通商口岸的報紙密集地報導相關新聞，重刊以往累積的臺灣知識。上海的亞洲文會（或稱北華文會），也應景地推出相關的演講活動。在 6 月 18 日請到曾在淡水海關工作過的上海（江）海關副稅務司兼造冊處官員廷得爾（Edward Core Taintor），整理前幾年相關海關貿易報告來介紹臺灣北部的原住民。[71]內容摘要被刊載在上

66 “Hongkong,”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26, 1873, p. 91;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6, 1873, p. 67, both cited from *the China Mail*. 第二則轉引的報導是“Tau-Ke-Tok,”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31, 1873, p. 107;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9, 1873, pp. 123-124, cited from *the China Mail*. 前則報導回顧了李仙得與卓杞篤「簽約」的過程，也提及簽約時在旁以及在文件上作見證人的必麒麟，已經去了新加坡。

67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pril 8, 1873;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0, 1873, pp. 306-307.

68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7, 1874.

69 “Amoy,” *The Hong Kong Times*, August 12, 1874, p.2; “The Arrest of General Le Gend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ug. 22, 1874, pp. 200-201.李仙得該封抗議信的署名時間是 8 月 7 日。

70 *The Japan Weekly Mail*, August 8, 1874, p. 629.

71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18, 1874, p. 563. 廷得爾爲美國人，1875 年的海關〈新關題名錄〉中記載，他於 1865 年 8 月入海關服務，1868 年任淡水關代理稅務司，1873 年 10 月升任爲造冊處文案（Statistical Secretary, I. G.），辦公室在上海而非北京。“Service List, 1 August, 1875,”

海英文的《字林西報》、香港中文的《循環日報》以及橫濱的《日本郵報週刊》上。[72]上海的英文報刊《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更在 1874 年英譯、重刊法國神父馮秉正（De Mailla）1715 年的作品，題名爲《福爾摩沙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Formosa*）。[73]這些密集的臺灣相關活動與報導，顯示通商口岸英文讀者群，不只對進行中的日本出兵臺灣新聞、也對臺灣歷史背景知識有高度興趣。

這些在港際情報體制裡流傳增衍的臺灣知識，透過臺灣事件進一步擴大。1874 年 6 月底日軍掃蕩高士佛與牡丹等番社後，上海《字林西報》整理重刊日本各主要港口報紙上臺灣出兵的相關新聞，收錄長崎《旭日報》（*The Rising Sun*）所刊「依照力量大小排列的（瑯璚）十八社表」（下表左），依序列出各社（男丁）人數、首領名字，以及友好或敵對程度。此表被多份口岸報紙轉載，除了上海的《字林西報》外，橫濱的《日本郵報週刊》以及香港的《德臣西報》等皆轉錄。[74]這份對日本軍隊來說可能極爲有用的「敵情／友軍」情報，可以說明本文所要強調的英文報作爲相關訊息中介的角色。上海的《教會新報》在沒有其他中文材料的對照下，直接將其英文音譯成中文轉錄（下表右）。[75]

---

in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ed.,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4*, p. 220. 海關轄下的這個統計與出版的機構，生產許多統計與文字資料，見張志雲，〈中國海關造冊處與中央統計制度（1859-1911）〉，「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2013 年 8 月 11-13 日。

72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23, 1874, p. 535;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7, 1874, pp. 591-592; *The Japan Weekly Mail*, July 4, 1874, pp. 548-549. 〈台灣生番〉，《循環日報》，1874 年 7 月 6 日，該報將 Taintor 譯爲顛沱，本文則譯爲「廷得爾」，連同前文的「許妥瑪」，皆是依從海關〈新關題名錄〉之譯名。

73 De Mailla, S. J., *The Early History of Formosa* (Shanghai: Loureiro & Co., Printers, 1715, 1874). 重刊的日期應該是 1874 年 8 月初，見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 10, 1874)的介紹。

74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29, 1874, p. 599; *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27, 1874, p. 511; *The China Mail*, July 10, 1874; 《德臣西報》轉錄時更註明，該表來自某位侵臺日軍的隨軍醫師。

75 〈臺灣生番十八社〉，《教會新報》，期 294（1874 年 7 月 11 日），頁 308-309。

各地英文報與上海《教會新報》上的十八番社表

TABLE OF TRIB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IR POWER.

Name of Tribe.	No.	Name of Chief.	General Character.
Boutans	250	Arock	Extremely fierce
Sabarie	220	Isa	Friendly disposed
Cuscus	190	Isunemot	Wicked & barbarous
Mantits	175	Cartoy	Friendly
Kachirai	165	Foorui	Peacefully inclined
Pattotinpy	160	Ahou	——
Pakarot	155	—	——
Shaporit	142	—	——
Osuanto	130	—	——
Ropot	126	Mamot	——
Chinakia	120	—	——
Lianruan	114	Pinary	Friendly
Bica	90	Singio	Friendly
Putgekin	86	—	Savage
Turasock	74	Tohutock	Friendly
Kanton	60	Asam	Friendly
Teckisha	52	Senrin	Wicked
Kowarts	50	Puararin	do.

社	人數	頭目名	人之行爲
牡丹	二百五十人	阿喇	兇惡
薩巴里	三百二十人	以撒	和顏悅色
格司格司	一百九十人	以蘇里馬	蠻野
漫地邦	一百七十五人	加類也	和顏悅色
加樓讀	一百六十五人	福類	平和
百多聽必	一百六十人	阿戶	○
巴格羅	一百五十五人	○	○
沙波力	一百四十二人	○	○
阿酸墜	一百三十人	○	○
羅擂	一百二十六人	滿末	○
清拉加	一百二十人	○	○
坭安六安	一百十四人	拏拉里	和氣
必家	九十人	新求	和氣
百地久	八十六人	○	野性
都拉開	七十四人	多福達	和顏悅色
甘棠	六十人	阿撒	和顏悅色
鐵几沙	五十二人	僧林	惡極
哥四丈	五十人	布阿拉里	惡極

資料來源與說明：

左：*TheNorth China Daily News*(Shanghai), June 29, 1874, p.599; "The Formosan Expedition," *The Japan Weekly Mail* (Yokohama), June 27, 1874, p.511; *The China Mail* (Hongkong), July 10, 1874; Edward H. House,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yo: Publisher Unknown, 1875), p.105.

右：「臺灣生番十八社」，《教會新報》，294 期（1874 年 7 月 11 日），頁 308-309。社名依序是牡丹社、射麻裏社、高士佛社、文率社、加芝來社、巴丁義社、巴龜角社、射不力社、獅頭社、羅佛社、四林格社、龍鑾社、八瑤社、內八瑤社、豬朥束社、猴洞社、竹社、龜仔角社。中文譯名參見自〔美〕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著，陳政三譯述，《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頁 142。

李仙得在其《臺灣紀行》裡也曾記載各社的人數，甚至包括婦孺在內；他並說明這是來自 1867 年與必麒麟一起到恆春尋找羅發號船員下落的洪恩（James Horn）的估計。學者推測，這份資料可能先是刊登在香港《德臣西報》上，再被李仙得收錄，也可能他看過洪恩的日記，或是由洪恩提供給他的。[76] 另在李仙得的一份外交文書裡，有一張「羅發號事件地圖」，也用這份人口資料作爲注解。[77]無論如何，《德臣西報》等口岸英文報紙，在 1874 年日本出兵前，可能已成爲李仙得等洋人重要的消息管道，以及引發後續行動的依據。

四、「洩露軍機」的香港《德臣西報》特派記者陳藹廷

十九世紀前半以來，以英文報刊爲基礎的「港際情報體制」累積的臺灣知識，成爲李仙得說服日本攻臺的知識基礎。日本出兵前後，透過輪船交通網，中、日各主要口岸的報紙，以英文報爲基礎，彼此傳抄臺灣事件的消息與評論。上海中文報刊上的相關消息，一部份來自香港的中文報如《循環日報》、《中外新報》等，絕大部份則來自上海當地、或其他口岸的英文報紙。上海《申報》在 1874 年日軍登陸恆春半島約兩個月後，承認近兩個月來對英文報紙消息的依賴：

> 自東人涉履臺灣以來，其先後各情，本館曾已陸續登錄。顧皆藉西人轉述，而西人又不通於華語及日本之言，則其傳述，或不免有失確處。本館居心務求其實，纖細不遺，是以於月前曾經特派華友，徑〔逕〕赴臺灣戰場，以記述諸事。一俟覆音郵至，則或能少補先時之所述，而軍情當更得詳確焉。茲姑就各報所得之耗，以總核近日臺灣之勢……[78]

---

76 見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p. 265, footnote7, 編者費德廉與蘇約翰的說明。

77 Le Gendre to Seward, April 12, 1868, in *MS 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Amoy, China, 1844-1906*, Vol. 3, pp. 444-451; 該地圖圖名爲“The *Rover*’s Case, South-Formosa Is,” 在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p. 395, 亦有收錄其彩色版本。

78 〈臺灣近勢〉，《申報》，1874 年 7 月 3 日，第 1 頁。

由於英、美等國政經勢力在中日通商口岸裡的主導地位，這些英文報紙在臺灣事件相關報導中，成爲主要消息來源。中、日官方與民間的相關動作與態度，被翻譯轉錄於這些英文報紙裡，再經由輪船交通，流轉於中、日不同的港口。

《申報》說西人不通中、日文，因此傳述有可能失確的說詞，僅只是想當然耳的評論。當時的東亞口岸形成以英文報紙爲中介的跨語傳播圈，光以英文報社人員而言，就有幾位華人的參與。在臺灣事件期間，香港、上海等地各英文報社，並不只轉錄相關當地中、日文報紙上的新聞或評論而已；這些口岸英文報紙，特別是香港的幾個報館，除了依賴臺灣開港後就有的來自府城或打狗等地零星通訊。在日本出兵期間，香港《孖剌西報》與《德臣西報》還派出了特派通訊員（Special Correspondent）到臺灣或廈門，就近收集相關消息。其中，《孖剌西報》的特派員，還跟前文提及的《東京日日新聞》岸田吟香一樣是隨軍記者；這位特派員從 5 月 21 日起連續 3 天，從日軍軍營裡發信回香港，報導日軍軍營位置因下雨淹水而移到他處、指揮官西鄉從道帶領 1,200 名援兵抵達，使當時日軍兵力總數達 2,500 人、並預計幾天後會增加到 3,000 人等等。這則香港報紙特派員回傳的消息，也被上海《字林西報》轉載。[79]

不光日本增兵臺灣的消息躍然紙上，中國政府因應日本出兵的兵力調動，也見於口岸英文報紙。日軍在 5 月初登陸瑯璚，陸續集結後續兵力，自 6 月初開始發動「戰爭」，焚戮牡丹、高士佛等社，但到了 6 月底結束後，並無離開臺灣的跡象。中國官方向日軍下通牒，要他們自 6 月 21 日（中曆 5 月 8 日）起百日之內離開臺灣，並開始調動精銳的淮軍前往臺灣，中日雙方劍拔弩張。《德臣西報》的華人特派員陳藹廷（陳言，又名賢）於 8 月 1 日抵達廈門，旋即向香港回報他在廈門得知的中國軍隊調動情況。這篇英文報導，也被上海《字林西報》部份轉載。王韜的《循環日報》將其翻譯成中文刊載，並透露作者爲陳藹廷：

79　“The War in Formosa,”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June 2, 1874; reprinted by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8, 1874, p. 527.

> 藹廷陳君，從黎召民觀察至臺灣。既抵廈門，即致書於德臣西字日報館云，由港至廈門，水程不過兩日。俟水師提督兵船來，方往臺灣。廈門街道，未甚修整，現寓居於茶行中，頗稱寬敞。廈門距臺灣密邇，時有消息。聞日人須索賠兵餉，方肯旋師。我國官憲，自五月初八日始，限以百日，即令其撤兵回國勿再逗遛。日人由瑯璚新闢一路，以過台灣之東。其路有兵駐劄，所築營壘，甚為堅整。若此則其志在久居，恐戰事不能免耳。聞我國官憲，特撥帑金八十萬製造電線，由臺灣以達廈門。華兵現已雲集於臺灣。即在郡城中，亦不下精甲萬人。李爵相麾下之眾，所謂經歷百戰者，亦不下七八千人。廣東調往勇丁，亦不下五六千人。從漳州府調至者，亦約五六千人，建營駐札〔紮〕於打狗，蓋為防禦計也。廈門砲臺，均已整列大砲，若備大敵而禦環攻。現有日本載兵運糧之船，泊於廈門修整機器。日本人特往廣門船澳，探察臺灣機事。日本謀密慮深，外人未能窺其底蘊。總之臺灣一旦有事，則廈門實扼要衝。聯絡聲勢，互成犄角，洵足以有恃無恐。[80]

陳藹廷跟王韜一樣，是最早一代的中國報人。中國報業史的研究者已指出，這些早期的中國報人，多半具備中英文雙語能力。王韜曾參與傳教士翻譯事業，陳藹廷出身港英政府的翻譯，兩人皆爲跨語新聞從業者的早期代表人物。[81]冼玉儀（Elizabeth Sinn）等學者考證陳藹廷的傳記資料顯示，他畢業於香港聖保羅書院。畢業後進入港英政府工作，待過幾個單位，最後在巡理署（Police Magistrate's Court）擔任書吏與翻譯。1871 年他進入《德臣西報》館當翻譯與助理編輯，負責該報中文專頁「中外新聞七日報」（見圖 1），並自 1872 年 4 月開始在該報館出版的《香港華字日報》擔任主編。[82]臺灣事件發生，

80 〈中外新聞：臺灣至近消息〉，《循環日報》，1874 年 8 月 7 日。原文英文載於 *The China Mail*, August 5, 1874;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12, 1874, p. 147.

81 卓南生，〈中國人自辦成功的最早華文日報──《循環日報》〉，《新聞學研究》，期 48（1994 年 1 月），頁 259-279。

82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2-134, 151; Elizabeth Sinn, "Chan Ayin," in May Holdsworth & Christopher Munn, eds.,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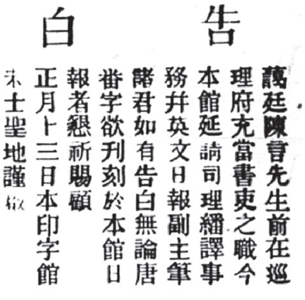
他擔任《德臣西報》特派員，在寫上段文字時，樂觀地認為中日之間一旦戰事開打，日本必然失敗，得到應有的教訓，因為戰爭需要資金，但日本政府的財力因平亂等因素已告急，可謂外強中乾。[83]這位愛國的香港記者不知道的是，當時清廷因為他洩露軍機，打算跨境緝拿他。原因不是前引這段概述中國軍隊調動的報導，而是陳藹廷更早的一篇「獨家」新聞。

陳藹廷任職香港《德臣西報》的啟事與上海《教會新報》對其「獨家」的轉載

MR. CHUN AYIN, late clerk in t[he]
Magistrate's Office, has been appoi[nt-]
ed Assistant Reporter on the China Ma[il]
and has this day entered on his duties.
CHARLES A. SAIN[T]
March 1, 1871.

THE CHINA M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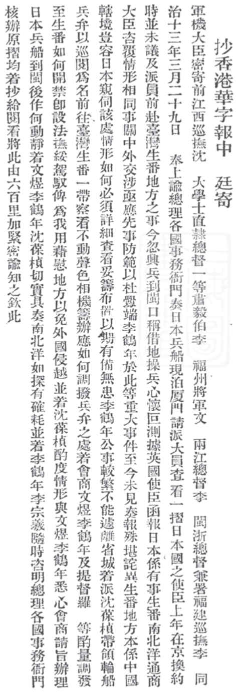
HONGKONG, WEDNESDAY, MAR. 1, 1871.


告白

藹廷陳音先生前在巡理府充當書吏之職今本館延請司理繙譯事務并英文日報副主筆諸君如有告白無論唐番字欲刊刻於本館日報者懇祈賜顧

正月十三日本印字館

禾士聖地謹啟


抄香港華字報中　廷寄

軍機大臣密寄前江西巡撫沈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　福州將軍文　兩江總督李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現泊厦門請派大員查看一摺日本國之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前赴臺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口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據英國使臣函報日本係有事生番南北洋通商大臣咨覆情形相同事關中外交涉亟應先事防範以杜釁端李鶴年於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見奏報殊堪詫異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李鶴年公事較繁不能遠離省城着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着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　等酌量調發至生番如何開禁即設法撫綏駕馭俾為我用藉慰地方以免外國侵越並着沈葆楨酌度情形與文煜李鶴年悉心會商請旨辦理日本兵船到閩後作何動靜着文煜李鶴年沈葆楨切實具奏南北洋如探有確耗並着李鶴年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原摺均着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密諭知之欽此

資料來源：
　左上：*The China Mail*, March 1, 1871.
　左下：「中外新聞七日報」，*The China Mail*, March 25, 1871.
　右：《教會新報》，期 294（1874 年 7 月 11 日），頁 309。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8-69; "The Death of Mr. Chun Oi-Ti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ug. 11, 1905; Ron Scollon, "Hong Kong Newspapers on the Pre-transitional Stage,"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2 (1997), pp. 48-59;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 1908), pp. 353-354.

83 〈中外新聞：臺灣至近消息〉，《循環日報》，1874 年 8 月 7 日。

這則獨家新聞，可以說明中文報紙在港際情報體制裡的角色。1874 年 6 月底，當日本軍隊仍在臺灣南端、並已攻擊過原兇番社之際，陳藹廷主編的《香港華字日報》（1872 年 4 月起刊行），在口岸中、英各報中，率先刊出了一份 1874 年 5 月 14 日的密諭「廷寄」。[84]該文經由軍機大臣，密令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爲名，前往臺灣一帶，密爲籌辦」，並與福州將軍文煜，以及閩浙總督李鶴年等人會商，如何調撥兵弁加以因應。[85]香港中文報紙刊出的這篇密令，旋即被上海的《教會新報》以及《上海匯報》轉載（左圖）。[86]香港《德臣西報》以及上海《字林西報》等英文報，於 6 月底以及 7 月初，也將其翻譯成英文轉載。無獨有偶，中英文各報皆註明轉載自《香港華字日報》（*The Chinese Mail*），而英文報紙也註明，《華字日報》的該份獨家文件，來自該報的福州通訊員。[87]橫濱的《日本郵報週刊》則在 7 月 11 日引述上海《字林西報》，指出中國政府派出的欽差，「證實」爲沈葆楨。[88]

這篇軍機處的密諭在香港《德臣西報》與《香港華字日報》刊出後，即受到廣州讀者的批評。《德臣西報》的廣州通訊員指出，當地中國官員認爲，陳

84 北京官方的廷寄原文，見〈廷寄，據上摺諭李鴻章沈葆楨等〉，三月二十九日（1874 年 5 月 14 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3，冊 10，頁 3736-3737。《華字日報》刊出該上諭的確切時間待考。日本國會圖書館關西分館所藏的早年《華字日報》版本微卷，在該期間正好有缺漏；據〈兩江總督李宗羲奏滬新聞紙登刊密諭非由上海洩漏摺〉，日期未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8，冊 10，頁 3941-3942 所載，該文刊登時間是 1874 年 6 月 25 日(中曆 5 月 12 日)。但 6 月 24 日同一報館的《德臣西報》則指出《華字日報》已得到該文件，並英譯刊出。如果再考量《德臣西報》爲晚報，推測在《華字日報》上的刊載時間極有可能爲 24 日當天或前一日 23 日。少數幾篇對《華字日報》的研究，見卓南生，〈十九世紀「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日期之探討——訂正戈公振一八六四年創刊說〉，《新聞學研究》，集 42（1990 年 1 月），頁 63-70。

85 〈廷寄，據上摺諭李鴻章沈葆楨等〉，三月二十九日（1874 年 5 月 14 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3，冊 10，頁 3736-3737。

86 《教會新報》，294 期（1874 年 7 月 11 日），頁 309。《教會新報》即著名的《萬國公報》之前身；《上海匯報》則是於當年（1874）6 月 16 日起刊行的一份中文日報，發行人爲廣東人鄺容階（其照），主筆爲管才叔，見〈上海添新聞館〉，《教會新報》，291 期（1874 年 6 月 20 日），頁 288。

87 *The China Mail*, June 24, 1874, p. 3 ;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4, 1874, p. 15.

88 "Formosa (From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Correspondence),"*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11, 1874, p. 559.

藹庭揭露的這份由軍機處所發出如此重要且機密的文件，不至如此輕易地外流，該「假文件」的目的，極有可能是要誤導日本人。[89]

事實上，後來被收錄在《籌辦夷務始末》的該份密諭是眞的。1874 年 9 月軍機處還因此針對此次的密諭洩漏，下令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李宗羲、福州將軍文煜等大臣，徹查這樁經由中英文「新聞紙」洩密源頭。[90]一名同知（文紹榮）因此被派往香港調查，回來後稟稱：「香港《華字月（日）報》，發端餘德臣洋行之新聞紙館。平日《京報》等件，俱其首錄。詢諸該館西人，以爲出自主筆之人。續查出主筆陳賢，即陳靄亭，廣東新會縣屬潮連司人，自幼入天主教。於六月間，已到福建，而停留福建何處，當時再三追求，無從得實」。[91]這位同知沒有查到的是，陳藹廷到福建（廈門）的目的，是作爲中文世界第一位戰爭報導特派員，前往與臺灣事件關係最直接的通商口岸廈門，以便獲得更新的消息。

中國政府派出沈葆楨探查日軍虛實這一初步舉動，早在《華字日報》刊載該份廷寄的六月底前，就已經是英文報紙上公開的消息。例如上海《字林西報》在 1874 年 5 月 29 日即指出，沈葆楨受到朝廷命令，擔任欽差前往臺灣。該報導並介紹沈葆楨的簡歷，指出沈前此擔任過江西撫台（道）以及福州造船廠的中國官方領導。該報導同時揶揄中國官方終於醒了過來，開始注意日本出兵臺灣與中方在臺利益攸關的重要議題。陳藹廷也早在 6 月 5 日《華字日報》上指出，「日本人之用兵於臺灣也，我國未聞有拒敵之師。殆以汪洋之量，寬大之恩，容爲後圖乎？聞朝廷現命沈君葆楨專往查核，西人所論如此」。[92]橫濱《日本郵報週刊》也在 6 月 20 日刊出「北京政府派遣欽差沈葆楨前往臺灣。據信他在上海面見了還在那裡的〔日本特使〕柳原前光。沈葆楨曾任撫臺，或巡撫。

89 “Canton,” *The China Mail*, June 26, 1874, p. 3; “Cant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4, 1874, p. 15.

90 〈奕訢等奏上海新聞紙刊刻密寄論旨請飭查究片〉，七月二十五日（1874 年 9 月 5 日）；〈答上片〉，《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6，冊 10，頁 3857-3858。

91 〈福州將軍文煜等奏查辦密論洩漏流播情形摺〉，十一月初二日（1874 年 12 月 10 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99，冊 10，頁 3977-3978。

92 《香港華字日報》，1874 年 6 月 5 日。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上一個職位是福州船政局的領導」。[93]陳藹廷所英譯公開的廷寄，不過是上述消息的中國官方文件證明。港際情報體制下口岸英文報作爲中介的特點，再度得到證明。而在這跨語境消息傳遞的脈絡下，中國官方光從中文「新聞紙」去徹查洩密源頭，不啻緣木求魚。

陳藹廷於 1874 年 8 月初從廈門乘坐中國「砲舶」經安平抵達臺灣府（臺南）。這位可能是史上首位到臺南的香港人，在 8 月 12 日從臺灣府發新聞稿回香港。文中抱怨府城彷彿與世隔絕，雖然可以隨時經由中國官方的送信船將訊息由府城傳到廈門，卻無法反向得到任何訊息。唯一可能的管道是德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經營、航行中國東南沿岸與臺灣之間的海龍號（*Hailoong*）。然而，陳藹廷指出，該船最近只到打狗，不停靠府城（安平），使得他無從得知外界音訊。[94]從香港英文報紙上的船期消息來看，海龍號在該月只從香港經汕頭、廈門、福州等地往返於淡水，似乎連打狗都未曾停靠。[95]而陳藹廷也未能在府城取得甚麼新聞，只能向他的香港讀者回報「日人之役，未有新耗」。至於中國官方動作方面，香港《德臣西報》與《香港華字日報》共用的這一臺灣「府城消息」指出中方置辦鐵甲戰艦十艘，並打算與外國借款。在詳述當時中國海軍已有的幾艘砲艇（靜遠、安瀾、飛遠、揚武等）武器裝備與航行能力後，陳藹廷又指出，「上海船局（江南機器製造局）新建戰艦二艘，其一駛來臺郡聽命調遣，想不日可抵臺矣」。[96]

---

93 “The Formosa Expedition,” *The Japan Weekly Mail*, June 20, 1874, p. 490. 沈葆楨當時的官職是船政大臣。該報在此期刊頭註明該期所刊關於臺灣事件的諸篇消息，已先刊於該館日報。據此，該消息抵達日本的時間，又可往前推數日。

94 〈本館主人由臺灣（中曆）七月初一付來札云〉，《香港華字日報》，1874 年 8 月 21 日。

95 “Arrivals,”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August 10, 1874; “Departure,”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August 12, 1874; “Arrivals,”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August 24, 1874. 海龍號八月的行蹤分別是:淡水（8 月 2 日離開）、福州（8 月 4 日）、廈門（8 月 6 日）、汕頭（8 月 7 日）、香港（8 月 8 日抵達）；香港（8 月 11 日離開，往汕頭及淡水）、淡水(8 月 18 日）、廈門（8 月 21 日）、汕頭（8 月 22 日）、香港（8 月 23 日抵達）。

96 “The War in Formosa,” *The China Mail*, August 19, 1874, p. 3; 〈本館主人由臺灣（中曆）七月初一付來札云〉，《香港華字日報》，1874 年 8 月 21 日。

從陳藹廷在廈門與臺灣府的報導行文中可以推敲出，他似乎是中國「半官方」的隨軍記者。證據包括他從廈門到安平乘坐的是中國砲舶。行文裡偏中方的立場，以及在府城時得以利用官方的送信船將訊息由府城傳到廈門，再經由廈門輾轉傳回香港等。然而，不同於日軍的隨軍記者（不管是《東京日日新聞》的岸田吟香，或是香港《孖剌西報》的洋人特派員）可以前進到日軍在車城的軍營裡，陳藹廷到達的府城離事件發生地甚遠，也不是更前線中國軍隊集結的鳳山縣城。府城這個報導現場，不知道是陳藹廷自己的選擇，還是中國官方的安排。北京朝廷對陳藹廷洩露廷寄原文的追查，是否影響了陳藹廷到臺灣府後的中方消息管道，目前也不得而知。諷刺的是，這位同治朝的準欽差要犯卻在光緒朝成爲清廷派駐古巴的外交使節（副領事），專責處理古巴華工事件。

陳藹廷的幾則新聞報導，不僅具體表明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岸裡的華人在港際情報體制裡的可能角色，更凸顯本文強調以英文報紙作爲中介傳遞訊息的作用。同一篇報導以不同語言刊出的時間先後，也說明了這一點。以這份密諭爲例，它先是刊載於 8 月 19 日香港《德臣西報》上，8 月 21 日的《華字日報》再刊載中文版本。[97]正是這種與英文報紙的緊密連結，使得《華字日報》能夠先於北京朝廷，在總理衙門尚未收到威妥瑪「日本即將出兵」照會的 4 月 16 日，就已辨明橫濱英文報《日本公報》於 3 月 30 日所發出的日本將出兵 1 萬 5 千名到臺灣的消息人數錯誤。《華字日報》較接近事實地指出，日本兵力爲「水師兩千人」，正是巴夏禮告知威妥瑪的英國外交領事人員內部通信的數字。[98]而《華字日報》的這個消息，是來自前一日《德臣西報》的英文報導。[99]

97 “The War in Formosa,” *The China Mail*, August 19, 1874, p. 3; 〈本館主人由臺灣（中曆）七月初一付來札云〉，《香港華字日報》，1874 年 8 月 21 日。
98 《香港華字日報》，1874 年 4 月 16 日。
99 *The China Mail*, April 15, 1874.

五、結　論

本文指出，1874 年牽動中日兩國與歐美列強國際外交角力的臺灣事件，可以讓我們一窺當時東亞幾個主要條約港口之間訊息的傳播模式。輪船、電報以及各條約港出版的商業報紙，成爲這個訊息傳播模式的重要物質條件。這些基礎設施是建立在十九世紀中葉海上經濟活動之上，我將此稱之爲「港際情報體制」。港口間頻繁的輪船交通，與建立其上的郵務，加上 1870 年代以後串聯起幾個主要口岸的海底電報網，交構成這個體制中通信的物質基礎。各個城市的商業報紙，透過較以往便捷的輪船電報交通網交換新聞，在幾個鄰近港口城市之間，構成一個訊息連通管。各個地方享有幾近相同水準的資訊，進而形成一跨港、跨國、非官方的論述空間（inter-port discursive space）。具有情報價值的臺灣事件中，日、中兩國輪船運兵的消息，在這奠基於商業活動（輪船貿易）的跨語際的論述空間裡生成、流轉與辨正。確認這個論述空間的存在與運作方式，將可更深入研究十九世紀東亞各國在西人勢力影響下的諸歷史。

不管是日本政府海上運輸能量的建立，以及部隊的集結與發動，在如同蜘蛛網般的、以英文爲主要語言的海上貿易訊息體制裡，被網絡上的各方迅速知悉，牽一髮動全身。英國駐日使臣巴夏禮、美國前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以及日後也成爲外交領事的香港報人陳藹廷，皆成爲「港際情報體制」運作特徵與細節的主角。如前所述，不只清朝官方的秘密行動被跨語際、跨港口行動的報人公開，日本出兵臺灣，也是透過報紙轉載，被中文讀者知悉。其次，港口間更早的報業運作成爲李仙得累積臺灣知識的管道與再衍生的平台。海上貿易脈絡下出版的英文商報對商業、航運安全的高度關注，更成爲李仙得正當化一連串激烈手段的藉口。不管是中國政府震怒的《華字日報》洩密案，還是上海、香港兩地英文報館的通訊員（correspondent），從臺灣打狗、府城等地傳回上海、香港消息的過程，在語言上橫跨中、英文，空間上涵蓋長崎、福州、臺灣、香港及上海等地，均鮮明地呈現，存在於十九世紀東亞或中、日兩國通商口岸的「港際情報體制」。儘管這

些公開發行於中日兩國通商口岸及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報紙媒體，刊載的消息會有混亂不實與誇大，但卻因爲彼此共同在這個互通且公開的港際論述圈裡，自然形成相互辨正以矯正錯誤的功能。例如，《日本公報》誇大的「1 萬 5 千名」報導，雖然廣爲流傳，但旋即遭到跨港口的其他媒體質疑與更正。跨港口媒體，搭配著快速便捷的輪船與海底電報纜線，所形成的訊息迴路成爲中外各國官方人員方便的耳目。在這個局勢下，他們不得不「看報才知道」！

徵引書目

一、檔案、報紙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冊 10，北京：中華書局，2008。

《香港華字日報》（*The Chinese Mail*），1874。

《循環日報》，1874。

《申報》，1874。

《教會新報》，1874。

《日新眞事誌》，1874。

"Service List, 1 August, 1875." In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ed.,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4.*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5, pp. 219-243.

Le Gendre, Charles W.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MS British Foreign Office: Japan Correspondence, 1856-1905.

MS 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Amoy, China, 1844-190.

MS 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Hong Kong, China, 1844-1906.

The China Mail（《德臣西報》）, 1871、1874.

The Hiogo News（《兵庫新聞》）, 1874.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孖剌西報》）, 1874.

The Hong Kong Times（《香港時報》）, 1874.

The Japan Daily Herald（《日本每日先鋒報》）, 1874.

The Japan Gazette（《日本公報》）, 1874.

The Japan Mail（《日本郵報》）, 1873, 1874.

The Japan Weekly Mail（《日本郵報週刊》）, 1874.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報》）, 1867, 1871, 1873, 1874.

The North China Herald（《北華捷報》）, 1867, 1871, 1873, 1874.

二、專著

〔日〕小風秀雅，《帝国主義下の日本海運：国際競争と対外自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日〕石井孝，《明治初期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橫濱：有隣堂，1982。

〔日〕西里喜行著，胡連城等譯，《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美〕李仙得（Charles Willian Le Gendre）著，〔美〕費德廉（Douglas L. Fix）、〔美〕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Charlotte Lo）、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美〕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著，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台北：原民文化事業限公司，2003。

陳　萱，《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黎志剛，《黎志剛論輪船招商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31。

Bayly, Christopher Allan.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ritton, Roswell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76.

De Mailla, S. J. *The Early History of Formosa.* Shanghai: Loureiro & Co., Printers, 1715, 1874.

Griffis, William Elliot. *The Mikado's Empire.* New York: 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76.

Harcourt, Freda. *Flagship of Imperialism: The P. & O. Company and the Politics of Empire from Its Origins to 186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adrick, Daniel R.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evia, James.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Building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House, Edward H.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yo: Publisher Unknown, 1875.

King, Frank H. H., and Prescott Clarke, eds.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Le Gendre, Charles W.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Edited by 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A Sketch of the New Route to China and Japan by 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s through line of steamships between New York, Yokohama and Hong Kong, via the Isthmus of Panama and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Turnbull & Smith, Book and Job Printers, 1867.

Pickering, W. A.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f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

Schaffer, Simon, Lissa Roberts, Kapil Raj, and James Delbourgo, eds.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Sagamore Beach, MA: Watson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LLC, 2009.

Smith, Carl T.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Wright, Arnold, 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 1908.

Wenzlhuemer, Roland. *Connect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rld: The Telegraph and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afei, Chen, and Han Rongfang, eds.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74-1907.*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3.

三、論文及演講

〔日〕西里喜行，〈台湾事件（1871-1874）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一部・第二部，期 33（1988 年 9 月），頁 233-303；期 34（1989 年 3 月），頁 145-180；期 35（1989 年 12 月），頁 31-81。

〔日〕西里喜行，〈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 I）〉，《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集 38（1991），頁 48-118。

〔日〕岸本美緒，〈鴉片戰爭的消息：從江南到日本〉，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14 年 9 月 29 日。

〔日〕鈴木雄雅，〈日本における初期欧字紙について〉，收入〔日〕北根豐編，《日本初期新聞全集 1》，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頁 ix-xi。

朱瑪瓏，〈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卷 32 期 2（2014 年 6 月），頁 49-82。

朱瑪瓏，〈信任的邊界：1860 年代香港與上海的「港際情報體制」與滙豐銀行的成立〉，收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即將出版）。

林志龍，〈十九世紀以來英國遠洋定期航線與政府補助的發展〉，《新史學》，卷 17 期 2（2006 年 6 月），頁 219-236。

卓南生，〈十九世紀「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日期之探討——訂正戈公振一八六四年創刊說〉，《新聞學研究》，集 42（1990 年 1 月），頁 63-70。

卓南生，〈中国最初の華字日刊紙の新事実および新說——「香港船頭貨價紙」および「香港中外新報」をめぐって〉，《新聞學評論》，期 35（1986 年 4 月），頁 31-46、296-297。

卓南生，〈中國人自辦成功的最早華文日報——《循環日報》〉，《新聞學研究》，集 48（1994 年 1 月），頁 259-279。

卓南生，〈中國最早華文日報新史料的發現與研究：有關「香港船頭貨價紙」及「香港中外新報」的考究〉，《新聞學研究》，集 41（1989 年 4 月），頁 91-103。

卓南生，〈官板華字新聞および中国語原紙について〉，收入北根豐編，《日本初期新聞全集 1》，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頁 v-vii。

葉振輝，〈天利行史事考〉，《台灣文獻》，卷 38 期 3（1987 年 9 月），頁 41-45。

陳秋坤，〈土著的盟友，台灣的敵人：李仙得〉，收入〔美〕李仙得（Charles Willian Le Gendre）著，黃怡譯，《南台灣踏查手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12，頁 6-11。

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錄》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歷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178-185。

Fix, Douglas L.（費德廉）"'A Highly Cultivated Country': Charles Le Gendre's Mappings of Western Taiwan, 1869-1870." 《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3，2011 年 9 月，頁 1-45。

Gentz, Natascha. "Useful Knowledg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he Field of Journalistic Produc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47-104.

Kennedy, Paul M. "Imperial Cable Communications and Strategy, 1870-191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6:341 (October, 1971), pp. 728-752.

Sinn, Elizabeth. "Chan Ayin." In May Holdsworth & Christopher Munn, eds.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8-69.

Scollon, Ron. "Hong Kong Newspapers on the Pre-transitional Stage."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2 (1997), pp. 48-59.

Warner, Michael. "Wanted: A Defini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of Intelligence*, 46:3 (2002), pp.15-22.

Weipin, Tsai（蔡維屏）. "The First Casualty: Truth, Lies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sm in Chi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1(January 2014), pp. 145-163.

四、網路資源

〔日〕成田誠一，〈台灣出兵と三菱〉，《三菱人物傳・岩崎彌太郎物語》，Vol.12, 三菱集團官網，https://www.mitsubishi.com/j/history/series/yataro/yataro12.html。（2015 年 9 月 17 日檢索）

陳　萱，〈牡丹社事件隨軍記者岸田吟香的臺灣原住民紀錄——以「臺灣信報」爲中心〉，《原住民族文獻》，期 18（2014 年 12 月），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25&id=823。（2015 年 8 月 4 日檢索）

Hevia, James（何偉亞），何磊譯，〈帝國安全視野中的亞洲問題〉，https://site.douban.com/202478/widget/articles/12352650/article/33022145。（2016 年 7 月 1 日檢索）

Diplomatic Intelligence and Inter-port Journalism: The New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Troop Steamers during the Formosa Incident of 1874

Marlon Zhu*

Abstract

Studies on the nascent journalism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have largely been confined to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 emphasizing the rise of the reading audience and nationalism. In contras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ransnational journalistic practice at the time of the "Formosa Incident of 1874," a Japanese "expedition" to Taiwan, which was then occupied by aborigines and Chinese. I argue that the coastal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served as intermediari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mporaries, circulating news about troop movements among Yokohama,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major East Asian ports. Together with the advent of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regular steamship lines and the submarine telegraph, there existed an "inter-port intelligence regim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nsuls, missionaries, merchants, the foreign staff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and some Chinese journalists affiliated with the English press all became major players under the new regime. This Anglophone information circuit along the East Asian coasts, enhanced by the maritime economy, sheds light o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trade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Keywords: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trans-national journalism, inter-port intelligence regime, Formosa Incident of 1874

---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